

李寅生 著

論唐代文化對 日本文化的影響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1242.03/1

四川大學『2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論唐代文化對 日本文化的影響

李寅生 著



巴蜀書社

2001 • 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李寅生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11
ISBN 7-80659-291-1

I. 論... II. 李... III. ①中日關係—影響因素—
文化—唐代②文化史—研究—日本 IV. K313.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74721 號

策劃組稿: 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 王友平 李 蓓

封面設計: 文小牛

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李寅生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字數 160 千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ISBN 7-80659-291-1/I·113

定價: 16.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 5651045 5651203

引 言

中日兩國人民有着兩千年的友好交往歷史，自古以來，兩國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聯繫和相互的影響，這是兩國史籍所不斷記載並為歷史學家們在研究中所不斷闡明了的。無論從地理形勢上看，還是就文化和經濟的關係上看，中日兩國都有着不可割絕的息息相關的聯繫。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互相影響、互相學習，關係更是十分密切。

古代的日本勞動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勞動，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但同時他們也虛心地向文化已有高度發展的中國學習。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在航海條件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中國文化就已開始傳入日本。在日本北陸、山陰等地曾發現了很多形狀酷似先秦古鐘的日本製造的銅鐸。日本歷史學者認為中國早期文化曾以原始的交通工具通過日本海左旋迴流的自然航路傳入日本。古代的中國勞動人民以驚人的智慧和勇敢開闢了中日交通的道路，與此同時，中國的銅劍、銅鉞等物也經朝鮮橫渡對馬海峽傳入日本北九州等地區。

到了兩漢三國時代，中國和北九州一帶的交往漸多。中國古代史書《漢書》首次記載的“倭國”、“倭人”，即是指北九州一

帶的居民。據《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記載，在三世紀初中國的養蠶業已傳入日本北九州，當時中國北方社會經濟的組織，對日本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而在這一時期傳入日本的中國文化是儒家的傳統的詩教思想，它是隨着《論語》而同時傳到日本的。

四世紀中葉以後，北九州已歸入日本大和朝的管轄，日本不久就和中國的“南朝”開始了正式的通聘，當時的中國史書《宋書》所提到的“倭國”，已經不僅是專指北九州，而是泛指整個的日本了。五世紀時，日本人民就開始用漢字作為表達記敘的工具，並借用漢字作日語標音，即“萬葉假名”。“萬葉假名”的產生，為中日文化交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日本人已開始學習漢字的中國書籍，一般文教和禮俗也深受當時中國社會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唐代時，其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都達到了高峰，國勢強盛，聲威遠震，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唐朝初期，統治階級十分重視兄弟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及與鄰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當時的鄰近諸國，對唐朝也莫不仰慕；其中尤為突出者為日本。當時的日本知識界直接採取中國文化的源泉。日本政府派遣大批學生到中國留學，留學生中較多的人是為“求佛教”而來的“學問僧”，但入學于唐國子監的一般日本“學生”，其學習範圍之廣，留學年限之長（最長時間達三十餘年），使他們有可能不僅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精研中國文學或法律、醫藥、天文等專門學問。這是兩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十分重大的事件。由是揭開了日本歷時一千年學習中國的序幕，在這一千年中，中國文化尤其是盛唐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這種影響使得日本文化在許多方面都帶有很深的唐代文化色彩。直到今天，這種影響依然存在。

目 錄

引 言	(1)
第一章 盛唐時代的社會氣象	(1)
第一節 盛唐社會在當時世界上所處的地位	(1)
一、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頂峰	(1)
二、良好的周邊環境與對外政策	(11)
三、萬邦來朝	(16)
第二節 盛唐的社會風采及其文化輻射	(18)
一、社會風采	(19)
二、文化輻射	(31)
第二章 日本社會在唐代以前的形成和發展	(38)
第一節 日本國家的形成歷史	(38)
一、從先土器文化到繩紋文化	(39)
二、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發展	(42)
三、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及其所處的地位	(50)
第二節 日本與唐代以前中國歷朝政府的關係	(53)
一、《漢書·地理志》所記載的日本情況	(54)
二、《後漢書·東夷傳》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關係	(55)

三、《魏書·倭人傳》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交往	(58)
四、南北朝史書所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關係	(63)
五、《隋書·倭國傳》所記載的日本情況及中日關係	(67)
第三章 唐代的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往	(77)
第一節 日本人眼裏的大唐帝國	(77)
第二節 遣唐使	(79)
一、遣唐使來華的目的和次數	(79)
二、遣唐使的分期和組成	(80)
三、遣唐使的航行綫路	(84)
四、遣唐使所受的禮遇及日本對待唐朝的態度	(87)
五、遣唐使和對唐文化的吸收及日唐貿易	(90)
第三節 遣唐留學生和學問僧	(93)
一、遣唐留學生和學問僧的數量	(93)
二、遣唐留學生、學問僧在唐朝的生活和學習	(95)
三、遣唐學問僧與日本佛教	(98)
四、傑出的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	(101)
五、圓仁與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104)
六、遣唐學生和學問僧帶回的唐朝物品與日本的印刷文化	(113)
第四節 鑒真東渡	(118)
一、鑒真東渡的目的及意義	(118)
二、鑒真東渡與日本新佛教	(120)
三、鑒真師徒的學識對日本的影響	(122)

第五節 唐官方使者和地方使者與日本的往來	(126)
一、唐官方使者與日本的往來	(126)
二、唐地方使者與日本的往來	(127)
第六節 民間往來	(128)
一、商船的往來	(128)
二、學問僧的往來	(129)
三、貿易往來	(131)
四、其他	(132)
第七節 詩人學者之間的友好往來	(134)
一、盛唐時期	(134)
二、中唐時期	(135)
三、晚唐時期	(135)
第四章 唐代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145)
第一節 唐代政治對日本的影響	(145)
一、大化改新	(145)
二、仿唐制設立典章制度	(146)
三、仿唐朝制定日本年號	(151)
第二節 唐代儒學、宗教、哲學對日本的影響	(154)
一、儒學對日本的影響	(155)
二、宗教對日本的影響	(158)
三、哲學對日本的影響	(166)
第三節 唐代科技對日本的影響	(168)
一、農業生產對日本的影響	(168)
二、唐代建築對日本的影響	(169)
三、唐代醫學對日本的影響	(171)

第四節 唐代文學藝術對日本的影響	(172)
一、創作觀與創作思想對日本的影響	(173)
二、當用漢字的產生	(175)
三、日本漢詩的產生	(178)
四、空海與《文鏡秘府論》	(183)
五、史學及其理論對日本的影響	(186)
六、唐代教育對日本的影響	(187)
七、唐代書法對日本的影響	(190)
八、唐代音樂對日本的影響	(191)
九、唐代的美術工藝對日本的影響	(193)
十、唐代文獻圖書對日本的影響	(196)
第五節 唐代風俗習慣對日本的影響	(198)
一、識緯術	(198)
二、曆法	(199)
三、服飾及其他	(199)
四、節氣、節日對日本的影響	(201)
五、體育對日本的影響	(202)
第五章 唐代文化影響日本的意義	(207)
第一節 唐代文化影響日本的積極意義	(207)
第二節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不足與反思	(209)
主要參考書目	(211)
後 記	(214)
又 記	(216)

第一章 盛唐時代的社會氣象

第一節 盛唐社會在當時世界上所處的地位

公元 618 年，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唐朝。此後幾年間，李淵父子打敗了地主割據勢力，鎮壓了各地的農民起義軍，統一了全國，恢復了地主階級在全國的統治。武德九年（626 年），李世民在長安宮城的玄武門發動政變，殺掉了他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不久，李淵退位，李世民繼立為帝，是為唐太宗。李世民繼位以後，他和手下的大臣們認真吸取了隋朝滅亡和農民起義的教訓，採取了一系列的減輕人民負擔、緩和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生產、加強國家綜合國力的措施，同時唐太宗還整頓吏治，大力改革唐朝的政府機構，注重發展同邊疆少數民族及其周邊鄰國的關係，使社會很快走向了安定和繁榮。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多年中，國家政治、經濟達到了空前繁榮昌盛的局面。這種局面使大唐帝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強盛的國家。而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都與唐王朝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根本無法與之相媲美。

一、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頂峰

1. 政治方面

在古代世界範圍內，盛唐帝國的強盛的確令人艷羨。

它的疆域遼闊，極盛時其勢力東至朝鮮半島和大海，東北至黑龍江和外興安嶺一帶，北至蒙古，西北至蔥嶺以西的中亞，西越巴爾喀什湖，南及南海諸島和印度支那。“前王不辭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載之鄉，並爲州縣”^①。

盛唐時期，境內居住着許多民族，由于統治者採取了民族友好的政策，尤其是太宗、武后、玄宗當朝時，他們以開明的胸懷和多樣化的懷柔——羈縻手段，使得許多少數民族歸附于唐王朝，各民族人民辛勤勞動，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這種民族政策的執行結果，使得少數民族地區得到了開發和發展，爲邊疆地區的穩定和國家政治的穩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朝的天子不僅是漢族人民的皇帝，而且也被少數民族的“諸蕃君長”尊爲“天可汗”，成爲了各民族共同的最高君主。當然，各民族統治階級之間也發生過糾紛和戰爭，但和平友好與共同發展畢竟是主流。

盛唐時的軍事力量也是非常強大的，唐初的統治者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發明了當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府兵制，實行兵農合一的政策。府兵平時從事農業生產，閑時教習軍事，戰時征發入伍，戰爭結束後，便“兵散于府，將歸于朝”^②。這樣做既減少了政府的軍費開支，又有利于邊防守戍，增強了國家的實力。

在行政機構方面，唐朝大體上繼承了隋朝，使得三省六部制更趨完備，各負特定職能的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相互運作，既能“相防過誤”^③，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君主的獨斷。此外，

① 《大唐詔令集》卷十一“太宗遺詔”。

② 《新唐書》卷五十“兵志”。

③ 《貞觀政要》卷一“論政體”。

唐改隋朝郡、縣二級爲州、縣二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唐太宗按山河形勢，分全國爲關內、河南等十道，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權。

在法律制度方面，唐代的法律制度已制定得非常嚴密。唐太宗時組織了一批熟悉和精通刑律的官僚如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等人，研究歷朝，尤其是隋朝的刑律，根據“國家法令，惟需簡約”的精神，制定了保護其專制統治、維護封建倫常的《唐律》。到了唐高宗時，又按《唐律》制定疏議，並加以解釋說明，制定出《唐律疏議》。《唐律疏議》是我國流傳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與古代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是世界著名的法典之一，對後世影響極大。律（法律）、令（對國家各種制度所做的規定）、格（有關行政機構具體事物處理的細則）互爲補充，構成了大唐王朝完備的律令制度體系。

2. 經濟方面

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後，“東起海岱，西至伊洛，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①，全國的人口不滿三百萬戶。在這種情況下，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成爲唐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唐高祖、唐太宗積極調整統治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旨在緩和階級矛盾、與民休養生息的措施。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唐初制定的各項制度和法令，如頒行均田令和租庸調法、檢查戶口和編訂戶籍、放免奴婢、驅民歸農等，這些制度和法令對於安定人民生活、恢復社會經濟、保證政府的財政收入、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① 《貞觀政要》卷二“論納諫”。

武則天執政時期，她比較重視農業生產，命人編成了農書《兆人本業記》，勸民農桑，整修水利，使民“家有餘糧”。此舉使高宗以來的趨于激化的社會矛盾和人口流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和。

玄宗開元年間，勵精圖治，任用宰相姚崇、宋璟等，整頓綱紀，促進生產，社會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據《新唐書》記載：“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① 封建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戶口從唐初的不滿三百萬戶，猛增到九百餘萬戶，人口達五千萬^②。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先進的生產工具得到進一步的改進和使用，鐵礦的開採和鐵器的生產，已由黃河流域擴大到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水利灌溉事業也十分發達。唐朝政府設立了專職管理水利的機構“水部”，興修整治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一些邊塞地區如河套、天山南麓及桂林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開墾。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也由此傳到了邊疆，對推動邊疆地區的開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勞動人民的努力，創造了大量的財富。糧食、布帛、油鹽等不斷從各地運進長安和洛陽的國庫，從考古發掘中可以發現，唐時的含嘉倉，推算可藏糧食達三百多萬石，遠遠超過隋朝時的藏糧記錄。

唐時的手工業有官營和民營兩類，其中官營的手工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組織管理工匠和製造經營工藝產品，促進生產技術的改革和發展，因而唐代的民間工業

① 《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

② 參閱《通典》卷七、《食貨典》七、《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

與前一朝代相比，各方面都有了較大的發展。絲織染業是中國傳統手工業，到了唐朝時，它規模大、分工細，手工業更為精巧。所織染的各種精美綾錦，爭奇鬥艷，絢麗多彩。揚州、定州、益州所織造的特種花紋綾錦，馳名中外。唐代的絲織品花色很多，僅從新疆吐魯番發現的就有四十多種。此外，江蘇京口、浙江吳郡的綾錦，桂林的桂布，越州的綾紗，涼州的毛毯等，都是遠銷國內外的名產。

唐時陶瓷以邢瓷、越瓷最為有名，而洪州的昌南鎮（今江西景德鎮）出產的青白兼有的瓷器，別具特色，是後起的名產。唐朝還創造了著名的陶瓷唐三彩，在白底的陶胎上，刷上一層無色釉，再用黃、綠、青三色加以裝飾，燒成色彩非常艷麗的三彩陶器，造型生動逼真，為世界陶瓷的珍品，在古代手工業藝術品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唐代的採礦業也有所發展。兗州的萊蕪，在唐時冶鐵鼓鑄不絕，是漢唐以來最著名的冶鐵鼓鑄地區，在當時就己能用水力鼓風冶銅。揚州的江心銅鏡，遠銷中外，舉世聞名。金銀銅器的製作，已經具備了切削、拋光、焊接、鍍、刻、鑿等精巧工藝。近年來在西安唐邠王府的舊址發掘中，發現了貴族使用的金銀器二百餘件，從器物的形制和器面的光澤上，可推斷當時己能使用手搖腳踏的簡單車床了。

在造紙工藝方面，宣州的案紙、揚州的模紙、杭州的黃白狀紙，都是唐時進貢的名紙。唐玄宗時，造紙名家蕭誠用山西野麻和河南土谷滲製的五色斑石紋紙，足以說明造紙技術到了唐代己有了很大的進步。著名女詩人薛濤所製造的十色彩箋綾紋紙，被稱為“薛濤箋”，曾深受當時文人的歡迎。由于唐代文化的高度

發達，各地還出現了規模較大的造紙作坊。與此相關的是，雕版印刷術也發明了。據史載，唐初時的玄藏就曾利用雕版印刷來印刷佛像，但使用却很不普遍。而到了唐朝後期，雕版印刷術則已被廣泛使用。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剛經》，經卷高30公分，長約5公尺，由7個印頁粘接而成。卷首是一幅扉畫，後面是《金剛經》正文，畫和正文文字都刻得很精美。刀法的純熟和印刷的清晰，足以說明當時的刻印技術已經很成熟。

唐代的市場十分活躍，出現了許多人口密集、貿易興旺的繁華都市，最著名的長安、洛陽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中心，也是主要的國際貿易市場。當時北方的行會組織很發達。據北京房山雲居寺保存的石經資料所載，僅幽州（今北京市）一地，可以考知的行會名目就有三十多種，如白米、布、絹、絲帛等行。當時的長安城中，經濟繁榮興盛，市場商賈雲集，許多中亞、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也都聚集于此，從事着經濟貿易活動。

到了唐朝後期，揚州由于地處運河入長江的交叉點的有利位置，沿河兩岸車船櫛比，店鋪林立，中外商賈雲集，貿易非常發達。它與益州是國內最大的商業城市，史稱“揚一益二”。廣州是唐代南方最大的國際貿易城市。它主要以對外貿易為主，東南亞的林邑、真臘、師子等國都到廣州經營貿易。

唐朝的經濟貿易之所以非常發達，運輸貨物的通道能够貫穿全國及至周邊地區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共有向西南、華南、遼東、漠北、西域及中亞、歐洲五條幹綫。此外還開闢了從四川通向尼泊爾、印度和雲南通向緬甸的通道。水路運輸以揚州為中心，大運河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

錢塘江五大水系以及其他河流湖泊，構成了全國的水路網，並發展成了抵達日本、高麗、越南、馬來半島、錫蘭等國家和地區的水路。唐朝在主要的水路交通綫上，每隔三十公里便設一驛站，以便傳遞公文和官吏商旅的往來，極大地促進了國內外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

從唐朝整個朝代的經濟發展來看，雖然在天寶末年及唐中期、後期的個別階段出現過一些經濟發展受到阻礙的現象，但就整個唐代而言，尤其是盛唐時期，乃是中國封建經濟的大發展時期。其整個的經濟繁榮，正如杜甫名句所言：“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① 作為一個詩人，杜甫所言雖不免有理想化之嫌，但與時人多方記載相證照，基本上是真切的盛唐社會生活寫照。

3. 文化方面

中華帝國傳統的大一統文化組織在唐代得到了大大的完善。

唐代的學校自開國後經百餘年的經營發展，學校制度在當時的世界上來說已是相當完備的。不僅中央設有“國子學”、“太學”等國家高等學府，而且地方學校也深入到鄉里，有里學的設置。與前代相比，唐代的專業教育開始確立。天文、醫學、算學等自然科學的專業學校或專業訓練，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現的專科學校。唐代的教育還往往把教育、研究、行政三者結合為一體，如太醫署、司天臺、太樂署等兼有行政機關、研究所和學校的作用。

^① 杜甫《憶昔》詩。

由于學校和教育較之前代有了進一步的普及，使得唐代的文化風貌得到進一步的改觀。而文化風貌的改觀，往往直繫于文化主體即知識精英的人格、心態與素質的轉換，唐代便是一個士人階層性大變易的時代。魏晉南北朝時，門閥世族地主階級憑借門第、族望而世代盤踞高位，享有各種政治經濟特權，而寒門庶族則進身不易。這種狀況不僅壓制了大批的人才，也不利于統治階級進一步擴大統治基礎。唐太宗繼位之後，便把興起于隋代的科舉制進一步完善，進而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才選拔制度。這種制度正如西方學者 S·威廉斯所評價的那樣：

中國政府中文武官吏所產生的這種著名的考試制度，雖在古代的埃及或有類似的制度，但在古今任何一個大國中都可算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制度^①。

科舉制的推行，對於唐代文化乃至其後的整個中國文化流程都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科舉制的推行，使得唐政權具有一種開放性，大批中下層地主階級士子以及自耕農出身的讀書人，由科舉而入仕途，參與掌握國家的各級政權。同時，科舉制也成了當時官員來源主要的、後來甚至是惟一的途徑，古代讀書人基本上圍繞科舉這一中心來設計自己的生活道路。科舉制使得唐人文人不願受外物束縛，不甘于人生的寂寞，而追求轟轟烈烈的事業。這與消沉、隱遁的六朝士子之風是完全不同的。唐人的生命主旋律是入世，即把個人的功名與社會的責任聯繫在一起，渴求以自

^① 轉引自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臺北學生書局 1967 年版，第 390 頁。